

经济制度与 民主改革

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
COMMUNIST COUNTRIES

OLE NØRGAARD

[丹] 奥勒·诺格德 著

孙友晋 等译 冯绍雷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经济制度与 民主改革

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
COMMUNIST COUNTRIES

OLE NORGGAARD

[丹] 奥勒·诺格德 著

孙友晋 等译 冯绍雷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
(丹)诺格德著;孙友晋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ISBN 978-7-208-06378-5

I. 经... II. ①诺...②孙... III. 经济体制改革-
对比研究-俄罗斯、东欧 IV. F15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253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

——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

[丹] 奥勒·诺格德 著

孙友晋 等译

冯绍雷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59,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378-5/D · 1103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奥勒·诺格德教授是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比较政治学教授，久负盛名的萨尔茨堡研究会的撰稿人。先后获得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的政治学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曾赴莫斯科国家与法律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兼任丹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丹麦律师和经济学家协会、苏东地区研究协会北欧委员会、丹麦政治学协会、全美政治学协会、国际政治学协会的会员，在多个国际组织中担任丹麦国的代表。

诺格德教授精通俄语、保加利亚语和波兰语，长期从事原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的研究。1994年因在波罗的海国家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拉脱维亚大学荣誉博士。本书是其2000年的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也是其成名之作。

译者简介

孙友晋 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法学硕士，师从俄罗斯和转型研究专家冯绍雷教授。个人的研究旨趣包括：欧洲研究、现代化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与经济转型等。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迄今译作近 200 万字。

推 荐 序

借奥勒·诺格德教授《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之际,我想就近年来有关转型研究进展的情况和国内外学界正在关注和争论的一些问题之所知所闻,以及我推荐奥勒·诺格德教授此书翻译和出版的起因作一些介绍。

一

以体制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研究是最近大约 20 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个学科知识领域。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几乎是前后相继而又规模浩大的市场化和民主改革的浪潮。首先是自 70 年代中期开始,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最后几个权威主义政权发生更迭;随即拉丁美洲前殖民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也相继倒台;80 年代中期发生在菲律宾、韩国的政权更替则宣告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开启;紧接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股民主化浪潮发展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趋向。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中,当属原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它们脱胎于共同的苏联制度遗产,但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

表现出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当然,其余各地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进程也同样是有声有色。在原苏联东欧变化的观照之下,一个具有多种文化历史背景和多种体制的发展模式正在出现,但同样包含着主题相近的政治经济过程。20多年来,在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一切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太多的争论,也由此直接促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转型研究的诞生。

在这一领域的著作中,就国外的学者而言,既有像科尔奈早年的《短缺经济学》等作品,又有近年来热若·罗兰的《转型经济学》、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等这样一类学术导向性的著作,同时,也有像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这样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品。在我国国内有着像《比较》杂志这样的以转型比较研究为侧重点的专业学术刊物,也有像冯舜华教授等学者的《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等研究成果。其实,从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开始,我们对于国外的体制转型比较问题就有过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只是后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急剧变化,才使得人们的关注点一度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的模式。我曾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专门系统地收集和研究国外转型研究的著作情况,发现所谓转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涉及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在西方浩如烟海的同类著作中,奥勒·诺格德教授的著作则可以作为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早期转型研究较多侧重于单一学科背景,或者较为理论抽象的著作相比,诺格德的著作具有多学科、关注实证、以及不放弃对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这样一些特征。

之所以需要把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对象来看待,是因为这一领域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

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剧变相比较,冷战结束以来的各国内部转型与国际变化大体是在和平方式之下进行的,而不似以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非得在兵戎相见之下方告完成。越是以和平方式推进的社会变迁,则越是显示出推动这种变迁诸种动因所具有的前所未见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这里所指的动因既包含人类追求公平、自由与幸福的不懈精神,也包

含着对于与人类成长进步与生俱来的文明多样性的越来越多的尊重与肯定。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变局相比较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乃是席卷整个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是出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推动和物质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广大非西方世界各民族与多区域的振兴目标与实际需求之间有着某种呼应,从而形成了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要求改革传统体制、改变传统社会行为规则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式演进。全球化进程与和平方式的社会转型两者间的相辅相成不仅是为当前国际变局奠定基调,而且使得国内体制变迁与国际社会转型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直接,同时也越来越复杂的相互关联性。转型过程的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原先的估计。

就国内社会而言,当今世界的这场深刻而又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制度与社会转型,首先导致了既定体制框架的根本性变迁。无论是文明古国,还是年轻民族,也无论是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还是远在大洋的彼岸,改革之风所到之处,无不体制的推陈出新推波助澜。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强劲动力,既出自于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推动之下要求思想解放和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的吁求,也来自与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要求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状态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远不只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改变,它激发起的是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方式的变化,是对生存于各类制度环境之下的人们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是对历史铭刻于各个民族心灵上的传统印记的再认识过程。转型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社会集团与阶层虽然不可能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满意,但却必然会因此而改变各自的命运。

如何看待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在南欧、拉美、东亚以及原苏联东欧地区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过程¹,当今国际学界各个学科领域不仅关注理论,而且注重实证。可以发现,之所以各国学者普遍地对这样一个内容浩繁复杂、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和各个地区的国际性现象感兴趣,显然远远不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兴趣或者学科建设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评价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这样一些普遍性问题,如何看待在转型条件下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与经济稳定、制度构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关键性的理论

关系问题,而且更是与各国在上述普遍趋势下如何反应、如何互动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

二

就转型研究而言,我认为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转型过程或转型模式的同一性、普适性和本土性、独特性的问题。

我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生在拉美、东亚与原苏东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关键之点在于: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深层内在联系的客观同一的历史过程,这种客观同一的实质体现于下述六个方面:第一,就原苏联东欧、南欧、拉美与东亚各地区而言,尽管转型前体制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比如拉美的军人执政、东亚的专制集权以及原苏东地区的一党制,但是经济与政治高度集中管理的权力格局从结构上说具有内在同一性或相似性。第二,从社会转型的目标来说,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对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内在需求与主观推动,也无论是南欧以及随后拉美、东亚地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对民主化与市场化目标的普遍吁求,客观上都构成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遍及于上述各地区的转型进程的目标模式。第三,从转型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上述哪个地区都基本包含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第四,从转型的方式看,上述地区发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除了非常局部的地区社会转型伴随着一定的动荡形式,总体上并非在战争与暴力的推动下进行。这一局面构成20世纪末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普遍共性。第五,就转型的动因而言,上述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出现的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似乎也表明,彼时这场大转型在所难免,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总结的五大变化——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全球性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立场变化、外部行动者的观念转变以及“滚雪球”或示范效

应²——构成影响 70 年代末向民主政体实行过渡的普遍性动因,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但是,其中若干分析还是具有片面性,我在关于转型研究的其他文章中将会有所阐述)。第六,就转型的深层背景而言,上述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相对于历史的长时段来说,是一次几乎同步发生于非欧美国家或欧洲的边缘地带、发生于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独特的现代化过程。强势的西方文明、工业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状态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展理念、权力结构、实力差距、外部环境等诸方面的张力,使得这次转型进程既具有某种相似性,又显著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

在阐明社会转型中上述客观同一进程的同时,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拉美、东亚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在转型前提、路径依赖、结构组合及持续和发展态势等方面的多样性问题。转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广泛的历史进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日益被制度化了转型结果。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似的,而且是多样化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

转型多样性的表现首先体现于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换,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90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这一转变的实质意义是,在各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的方式、速率和政策组合来推进转型过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华盛顿共识”一个模式。同时,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为各国的转型进程带来巨大的启示意义。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按照自己的国情,推行节奏稳健的转型战略取得成功,其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业绩所蕴含的物质性意义。转型理论家中较为有影响的结论之一是,对转型过程的理解实际反映的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亦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思想无疑成为后者的典范。

再者,转型多样性的鲜明表现是迄今为止转型中各国不同的制度构建状况与不同的绩效。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实事求是地说,亨廷顿在

《第三波》中预言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确实各个地区与国家都不同程度取得了进展,但问题在于,这种进展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富有特色的实践。有些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较多地以欧美的模式为归依,而有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则较多考虑本土的传统政治资源,另外一个相当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平民主义的现象有增无减。就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而言,无论拉美、东亚还是原苏东国家都有若干共同的趋向,比如,在市场的构建过程中都遭受过金融危机的袭击,当前都处于对内深化、对外开放市场的阶段,但各国各地区的实践还是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转型的绩效方面,也充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东亚在一度危机之后依然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拉美曾经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与债务困扰后出现经济加速、原苏东地区的内部差异与总体复苏,构成了各个地区的基本特征。

总之,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以构建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宏大而普遍的转型进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互联系的客观外在性和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的扩展,同时也是各国当地传统、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一个多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各国转型的模式既是独一无二的,却又同时遵循着民主与市场演进的共同追求。统一与多样两者的并存是转型研究中最醒目的结论之一。正如本书作者诺格德教授在前言中所指出:“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普适化转型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这些独特性因素有助于塑造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似乎不可避免的制度变革。”

三

几年前我在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作访问研究的时候,得以有时间经常拜访华府各处书市。当我在第 20 街的书店里一读到

诺格德先生的这部著作,尤其是读到他言简意赅、情感真切的序言时,一下子就决定要买下此书。回来后,我在我的研究生教学中,曾经采用了不少该书的观点和材料。越是深入地研读此书,就越是觉得本书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本书作者始终是在对客观实际的认真掂量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中来展开本书主题的。他始终把关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行政能力与市场发展、民众动员与市民社会构建、制度变革与公共利益集团、转型中的赢者与输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放在一个多学科知识和多视角的相互作用中来加以评述。阅读全书会使你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有所启示,虽然,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解答并非能够在一本书中统统完成。

在多年来的转型研究过程中,比较研究通常是最常用也是较为公认的研究方法之一。³ 本书的研究正是沿袭了比较政治学的优良传统,重点对 20 个原苏东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进行了比较分析,本题的研究不光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而且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视野。笔者深切地赞同诺格德教授的下述结论,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我们必须理解各国独一无二的特性,运用比较法正是培养这种理解力的工具。这一方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哪些特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极为重要。政治改革者的责任,首先是能够正确地识别本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其中蕴藏的潜力,之后才是借鉴他国的经验。那种试图机械照搬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

比较研究的必然结果是对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这在目前国内国外的研究界还是一个争论问题。可能是属于我的一个偏见,我感觉的一个趋势是来自比较传统学科的学者不太主张轻易从事多学科研究,而在较为后起的学科的学者中则较为容易接受多学科观点。本书的作者显然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拥护论者。事实上,起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大概就很难在多学科方法方面刹车了。多学科方法的使用并不要求每一个当代学者都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但是,现代知识的综合和交错也常常使我

们单一学科的知识捉襟见肘。我个人以为,即使在学术浮躁的当代,主张在首先学好一门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接受其他学科的一些范畴,这并非是不可以作到的事情。本书在从事比较研究时对于多学科方法的娴熟运用,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本书的特点,除了上述的多学科方法和比较研究,除了对于转型过程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的探讨之外,笔者以为,诺格德对转型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所做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般地说,如仅从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过程来看,很多情况下是政治因素较之经济本身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政治前提的确立或者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往往确保了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行。但是“前转型时期”,比如 20 世纪 70—80 年代前期的东欧国家(包括原苏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在旧体制下发生的,其也为 90 年代后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东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局部的改革也发生在旧有体制之下,这与尔后的改革也有着密切联系,至少是对尔后的大幅度改革起到了某种基础性作用。其中,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相互关系是转型比较研究中必须予以重点讨论的问题。本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其结论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启迪。

本书的理论起点包括经济发展的选择理论、民主化理论和制度理论;而在方法论方面,则应用了比较统计法和个案分析法。书中以 1989 年到 1998 年期间的 20 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其理由是,它们最接近社会科学研究所需的“自然实验”条件,即上文提到的原苏东国家在转型初始条件、转型战略与转型结果方面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使其具有高度的可比性。⁴ 作者指出,其重点是要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建立起兼具经济发展、福利增长和民主巩固的经济制度,而有些国家却不能? 作者提出了下述基本前提或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从长远来看(除了极少数拥有相当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外),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着—国能否成功地实现为本国国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愿望。经济制度限定了如何使物资、人力和金融资源高效运作的激励机制。然而,这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的经济制度能否存在,首先取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

还决定着这种经济制度能否以一种可持续的民主方式分配公共产品。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实际是引导我们进一步理解民主化与经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

作者从两个层次入手对经济制度变革进行了政治学分析。第一个层次重点分析改革进程的外生性结构变量——包括外部环境在内的初始条件。第二个层次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制度改革战略。“初始条件”包括斯大林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西方所理解的“现代化”和“畸形”。“现代化”为正在进行的转型进程提供了一系列的资源,“畸形”构成经济和政治本质上的一系列障碍。“经济制度改革战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上可分为激进战略与渐进战略;而在政治层面上则分为三种具有规范意义的宏观制度改革战略:美国式改革战略,其特征是激进的经济改革战略和以精英竞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西欧式改革战略,其特征是渐进的改革战略,强调个体和集体的高度的政治参与;东亚改革战略,其特征是渐进的经济改革战略,但民主化滞后于经济改革进程,政治参与仅限于经济社团。在论证过程中,作者首先通过比较统计的方式评估初始条件的两大因素——现代化和畸形——与经济制度改革战略之间的相关性;之后,考察了制度变革的战略和指标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然后,阐述和评价了初始结构条件对改革者行动的制约和为其提供的机遇空间;接着,确认了使某些国家突破结构性制约(和相关成本)成为可能的框架条件,并重点阐述政治制度、民众动员与精英的作用;随之,论述了经济观念及其传播者以及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内和国际行为体的作用,并着重介绍了六个表现远远超出其初始条件所作的预期的国家;最后,作者从经济增长、福利和民主化的全球性视角重新审视从这20个原苏东国家获得的经验。

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相应的政治基础存在时,激进的经济制度改革模式才是可取的。如果经济与成本太高而不能在民主框架内被接受,缓慢而渐进的改革模式则更为可行,半途而废的制度改革在短期内造成的社会成本则甚于根本不改革。因此,任何经济制度改革战略必须考虑其处的政治环境。此外,作者还根据十年的观察结果指出,最理想的宏观经济制度发展战略并不是以狭隘的精英民主、自上而下的发展和政府

最小化为特征的美式发展模式,也不是以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大影响力、民主受到严格限制的东亚模式,而是类似西欧发展模式的宪政民主(更为可取是议会制民主)框架内的民众动员和参与。例如,作者在本书第八章指出:“自由共享型民主具有转型能力,那些赞成通过威权统治或精英治理的方式解决经济改革困境的人们却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型能力。”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在这些变革国家中存在的风险:“新制度常常会被传统结构所僭居,致使腐败和犯罪现象丛生,最终蜕化为一个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

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还指出,“转型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普遍地怀有另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俟民主建立,效率和福利必将如影随形般地自动跟进。正如本书通篇所论证的,这些民众的这些期望是错误的,是不切实际的。……制度变革一旦生效,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将不断地加剧”,“如果民众被这种幻想所控制,那么当他们发现,想象中的民主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实际生活中的体验相差很远时,民主本身将陷入危险之中”。诺格德教授的这一观点也与笔者的看法基本相符——从各地区转型的一般进程来看,简单地断言政治民主化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难以站得住脚的。至少,各转型地区与国家的高速增长大都出现在“前改革”时期,中国在这方面也许是一个例外。但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政治民主化从长时段来看,将为发展决策和动员民众提供更大空间,这也是势所必然。至于宪政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匹配问题看来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原则上说,这两者的相互支撑乃是成功转型的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具体的组合匹配状况,起步的时间、方式,宪政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各自实施的深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条件,甚至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最后,笔者还必须指出,在阅读作者提出的上述结论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应时常抱有存疑之心:既认识到作者所处的立场和价值观等因素使其在结论中形成某种固定性的偏好,使其的结论有失公允;同时也应认识到,面对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之间关系这一复杂的问题,其中所含变量的无限性和多样性,可能使我们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或许成为昙花一现的

一家之谈。毕竟作为“转型”这一现象才初始萌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与修正过程之中。不过,全书章节中的环环相扣和作者在论证过程中的层层追问和推论以及本书报采取的大量数据,充分显示了作者的逻辑严密和治学的严谨,这也极大地增添了本书在论断方面的说服力和信度。

实事求是地说,阅读本书需要一定的学养和耐心。不光是因为出现了一连串的新名词,诸如“理论的平行证明”、“背景对照法”、“宏观因果分析法”等等,而且,对于转型历史过程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也是能够阅读此书必要的准备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翻译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对于孙友晋同志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对于转型研究所做出的这一份贡献表示感谢。

冯绍雷

2006年12月于澳门

注 释

1. 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而其中又特别指向原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着市场与民主法治体制转变所伴随的社会转型。

2. 具体内容参见S.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3. 笔者认为,上述转型过程中的“统一”与“多样性”恰恰构成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意义。就转型比较研究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区域内层面,即同一区域内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另一个是跨区域层面,即全球视野下跨区域的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一般认为,在区域内层面上,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而在跨区域层面上,原苏东国家的转型与南欧、拉美、东亚的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可比性,迄今为止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参见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10—17页。

4. 转型问题专家瓦莱里·朋斯较好地概括了这种可比性。参见Valevic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 *Slavic Review*, Vol. 58, No. 4, Winter 1999.

前言和致谢

我一直认为,原苏东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具有要求民主的本能。我相信,原苏东国家数十年来所经历的历史将有效地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公民不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抱有兴趣。当前,这些国家的新兴民主制度所受到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经济制度转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这些成本由经济体制的初始条件所决定,但正如本书所证明的,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国际组织和本国精英联合推行的经济模式和转型战略所致。经济转型的进程可能危及民主,因为那些当初曾积极参与改革的普通百姓很可能为日常生计所迫,不得不告别政治活动。结果,政治操作领域常常被那些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培训、脑子里充斥着拜占庭式政治理念(spirits of Byzantine politics)的精英所控制。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绘制新的经济蓝图,不惜以牺牲(或推迟)民主为代价。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牺牲民主的做法常常被西方领导人和西方媒体所鼓励。后者固执地认为,民主制度只能由新生的资本主义精英(或原共产党精英)强加给不情愿的社会民众。在这种情形下,当社会衰败和政治腐化滋生出一群新的流氓无产者,民粹主义分子利用社会中的绝望心理和寻找替罪羊情绪进行蛊惑煽动时,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崩溃可能导致新生的民主制度陷于四面楚歌。于是,当人们预测那些正在向民主和市场同步转型的政权的前景时,经济制度的变革模式与变革战略变得至关重要。

由此,另一个问题应运而生,即当前所有研究都沿袭了比较政治学的传统。这一学科被埃克斯坦称为“解决问题的学科”(Eckstein, 1998, p.513)。我非常清楚,这种说法意味着该学科需要的是通才。这可能使